

生态博物馆建设中的三种关系辨析

李银兵 李 丹

(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贵州贵阳 550001)

内容提要:生态博物馆是一种理念和过程,而不是一种模式和结果,它需要在冲突实践中不断发展。社区民众作为生态博物馆建设的真正主体的地位尚未完全确立、博物馆建设中的文化保护功能还没有充分体现、经济因素考量与人文关怀在建设中还存在一些不和谐的表现,这是当前中国生态博物馆建设中出现的主要矛盾。因而,唤起社区民众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凸显社区民众在生态博物馆建设中的主体性地位;加强对社区文化的挖掘、整理和实时保存,对现有珍贵文化遗产的静态保护与活态传承;在生态博物馆社区旅游开发中,保存博物馆建设固有的人文价值,成为当今中国生态博物馆建设中的重中之重。

关键词:生态博物馆 多重关系 社区建设 人文价值

中图分类号:G260

文献标识码:A

迄今为止,生态博物馆建设在中国实践了整整二十年。二十年来,生态博物馆建设经历了从贵州走向全国的高涨阶段,也遭受过来自学理和操作层面上的双重批判与反思。正如学者所说:“生态博物馆有如航行在希腊传说中的女妖岩与大漩涡之间的船只,在神话般的过去与乌托邦的未来之间,进退维谷。”^[1]今天,在诸多矛盾冲击下的生态博物馆建设,大有被古村落或民族特色生态村建设取代之势,让人不禁唏嘘。具有诸如在地化保护、活态传承、文化生态、主体自觉、多元和谐等如此众多先进发展理念的生态博物馆,为什么在中国社会发展得如此艰难?通常来说,生态博物馆建设的主旨是文化保护与发展,而作为以研究人及其文化为主的人文学科来说,其内部也在兴起一股关系主义研究浪潮。基于此,本文抽取制约中国生态博物馆发展的三对核心矛盾,即主体与客体、建设与文化保护、经济与人文,本着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力图从关系现象中去找寻生态博物馆建设的核心和实质,从而为中国新一轮的生态博物馆建设提供一

些理论和实践上的支撑,进而最大程度地彰显生态博物馆建设的中国特色和世界意义。

一、生态博物馆建设中主体与客体的关系

恩格斯说:“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2]基于主体性原则在生态博物馆建设中的基础地位和作用,笔者认为要对生态博物馆建设中的各种关系进行梳理和研究,首先应该弄清建设中的主客关系。当前,就旅游场域中的生态博物馆建设来说,其背后的主客关系十分复杂。比如,政府、投资商、学者、民族主体、地方精英、媒体及游客等在某种意义上都可以成为主体或客体。尹绍亭说:“许多人认为,贵州生态博物馆的建设有缺陷,我想他们所说的最大的‘缺陷’,在于‘文化拥有者’没有成为‘原则’中宣称的‘参与者’,更不是‘主人’,而只是‘附庸者’或‘旁观者’。”^[3]生态博物馆作为一个舶来品,学界普遍认为其是一个发展中的理念^[4]。但在乔治·亨利·里维埃(Georges Henri Rivièrre)的“镜子说”^[5]、雨果·戴瓦兰(Hugues de Varine)的“责任意识”^[6]、勒内·里瓦德

收稿日期 2016-08-27

作者简介 李银兵(1976—),男,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文化人类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民族学、历史人类学。

李丹(1992—),女,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哲学。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文化创新视域下西部少数民族传统节日的社会功能研究”(项目编号:14BSH057)阶段性成果。

(Reve Rivard)的“生态博物馆:地域+传统+记忆+居民”^[7]及“六枝原则”^[8]的理念中,我们还是能找到生态博物馆建设的真正主体,即文化的建构者、保存者、受益者及发展者,也就是那些拥有独特文化、建设生态博物馆社区的当地民众。

从中国三代生态博物馆建设实际来看,社区民众主体的理念在建设则表现不一。贵州第一代生态博物馆坚持“政府主导、专家指导、村民参与”原则^[9];广西第二代生态博物馆采取“‘政府引导、专家指导、居民参与’的思路,‘专家指导’是核心”策略^[10];浙江第三代生态博物馆突出“居民与政府的良好配合及文化自觉”关键词^[11]。此外,云南民族文化生态村建设则倡导“村民主导、政府领导、学者指导”原则^[12]。在具体运作上,几代生态博物馆建设都存在政府唱主角、民众随从的状况,特别是经济相对落后的贵州和广西,生态博物馆建设资金都是来自政府的单一支持。而对于这种政府主导模式下的生态博物馆建设效果,潘年英、方李莉两位学者在对贵州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进行实地调研之后,得出了两种不同的认识。在看到当地生态博物馆建设面临的困境的同时,潘年英对当地生态博物馆建设对于社区成员文化个性的塑造持肯定态度,也正是在此意义上,他不仅对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充满信心,而且对梭嘎长角苗民传统文化的未来走向充满信心^[13]。方李莉在看到当地生态博物馆建设困难的情形下,得出生态博物馆建设理念有可能对于中国是一场更为深刻的文化殖民的结论^[14]。不可置疑的是,政府主导模式下的生态博物馆建设,对于博物馆社区文化保护确实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但也存在不少的问题。特别是在政府“输血”功能淡化、“造血”功能不强的今天,生态博物馆建设在实践上的滑坡就不是偶然之事了。此外,对于地处发达地区的浙江安吉生态博物馆建设来说,其建设资金采取建成后以补贴方式给村民的方式进行。在学界呈现一片赞誉声的同时,有的学者也指出了其资金链存在断裂的危险,但可喜的是安吉生态博物馆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村民主体的力量。虽然生态博物馆和民族文化生态村在产生背景、倡导者及性质等方面都存在着差异,但是“两者在一些基本理念上具有相同或相似之处”^[15]。具有同样发展理念的两个事物,二十年的发展实践证明了两者的建设效果大相径庭。今天的云南民族文化生态村,正在村民主导下如火如荼地开展,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从生

态博物馆和民族文化生态村建设主体的认定上来看,毫无疑问,村民主导的民族文化生态村走在了前面。同时,作为民间模式的贵州地扞侗族人文生态博物馆积极向上的发展态势,也不禁让我们去思索生态博物馆建设多重主体、主客倒置、真实主体及主客间的辩证关系问题。

诚然,对于贵州和广西这些经济欠发达地区来说,生态博物馆建设出现政府主导这种建设局面是必要的,而东部发达地区采取多方协作方式建设生态博物馆也是合理的。如果生态博物馆建设结果正如专家学者及政府官员所希望的那样,那么其必将成为中国文化保护的样板和标杆。但实际情况则是,生态博物馆还是没有跳出传统博物馆资料收集、保管、展示的功能,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加速了当地现代化进程,这对于文化的深层次保护很不利。比如,有学者在总结贵州生态博物馆建设问题时,认为“民族文化破坏严重、亟待保护”^[16]。对于这些与生态博物馆建设初衷有所背离的现象,有的学者和官员以“中国国情”、“本土化”和“村民对文化价值的认识还处于蒙昧阶段”^[17]等理由去解释或遮蔽。但笔者认为,从宏观看,是生态博物馆建设中没有充分考虑到中国国情、省情及当地情况,建设仅仅是官员、学者们过于“理想化”或过于“现实化”的“一厢情愿”的行为;从微观看,则是没有找到真正的文化主体,没有唤起文化主体的文化自觉。任何一个生态博物馆的建设,都不可缺少来自各方面力量的支持,但在各方力量中,村民是唯一的主体,其他外在力量则仅仅是客体和“路由人”,且“对外在路由人的过度依赖导致对民间社会资源的忽视,地方自组织能力受到削弱,最终难以形成一个理想的良性发展循环”^[18]。生态博物馆建设的主旨是文化保护与发展,而文化是村民的文化,是村民的生活方式或样态。学者、政府官员、投资商等外在客体采取的任何功利性或者外在性的行为,都仅仅是在影响村民,而真正决定村民生活的,恰恰是村民自己。因此,在肯定政府、学者、投资商等客体在生态博物馆建设资金、管理及理念上所起作用的同时,更应该尊重社区民众的主体性地位,唤起社区民众的自我教育,让他们真正达到文化自觉。

二、生态博物馆建设与文化保护的关系

学者们看到了中国生态博物馆建设中出现种种困境,但大多数学者对生态博物馆在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中的作用还是持肯定态度。龚世

扬总结广西“10+1工程”在文化保护与传承效应问题认为,其有效地保护和传承了民族文化、提高了居民的文化保护意识、丰富了民族文化的保护模式、延伸了国家的文化惠民政策。但在成绩面前,他充分地看到了制约当地文化保护与发展的诸多问题,比如,村民主动性、资金、文化保护难度及政策法规不完善等^[19]。胡朝相在贵州生态博物馆十年建设反思中,用一种理性视角探析了生态博物馆文化保护与发展的三阶段过程,提出了当前贵州生态博物馆建设过渡阶段的双重任务,即文化保护和消除贫困,但他对生态博物馆对当地文化保护与发展持十分乐观的态度^[20]。正如黄春雨所说:“生态博物馆就是一种新希望和新途径。因为它不同于文物保护单位,它关注属于静态文化范畴之内的建筑、生产生活用品等,更重视动态文化范畴之内的各种文化形式,特别是他们的价值观、审美情趣、生活方式、千百年来形成的精神特质。”^[21]总之,在成绩和困难的交织中,我们坚信生态博物馆建设对社区文化保护与发展起到了突出作用,生态博物馆建设是社区文化保护和发展的方向和未来,生态博物馆建设与文化保护和发展之间存在着高度的一致性。

但不可否认的是,生态博物馆建设与文化保护又是一对解不开的矛盾。比如,针对贵州生态博物馆的建设,有的学者指出“相关部门建设之初好大喜功、地方政府的决策取代了原住民意愿、运行的负面效应大于正面效益、建设实践背离了国际生态博物馆理念”^[22]等不足,因此,他提出“大胆地运用批判博物馆理论、社会生态学理论,并结合‘二律背反’对贵州和安吉生态博物馆群的建设与实践进行深入分析,提出生态博物馆在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面前,该淘汰的淘汰,该整改的整改,不该建的千万不能再建”^[23]。针对当前中国生态博物馆建设与文化保护中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对此开展批判与反思是必要的。正如批判博物馆学的提出者彼得·冯·门施(Peter von mensch)说:“‘批判’是一个积极的含义,是为了更好地认识博物馆,更好地认识自己……为了进一步发挥博物馆的社会意义,我们对博物馆应该采取批判的态度。”^[24]诚然,批判的目的不仅仅是否定,而是更高意义上的重建。

为了使生态博物馆建设和文化保护能达到和谐一致,笔者认为应该从如下几方面入手。

首先,认清文化的“变”与“不变”的关系,这是生态博物馆建设的理念基础。对于能被政府和

学者选为建设生态博物馆的社区来说,其文化本身是自成体系、独具一格的。但我们也不可忽视,文化本身是灵动的,不存在所谓的“原生态文化”和“再生文化”。特别是在全球化和市场经济驱动下的生态博物馆社区里,文化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巨大变化。因此,厘清文化的“变”与“不变”关系是建设与保护的出发点和基础。面对建设中存在的这对矛盾,我们首先应该承认“变”是永恒的主题,其次要在“变”中去找寻文化中的“不变”。当我们在认定村民衣着、住房、观念等方面的变化是他们文化自觉的启蒙表现的同时,也要提防一些社区及民众过于“现代化”的趋向,比如过于拜金主义、功利主义、现世主义及虚无主义等,更要批判与反思面对任何变化时,惊呼当地传统文化的消失、伦理道德的滑坡、人际关系淡薄的不理智呼声及错误思想。总之,在处理文化的“变”与“不变”关系中,我们欢迎文化“形式变”,但要留住文化实质、留住村民内在的文化之根。

其次,处理好文化保护与发展的关系,这是生态博物馆建设的实践基础。文化保护与发展关系一直是学界争论的议题之一,有“要保护,就不要发展;要发展,就不要保护;保护就是发展,发展就是保护”^[25]等不同观点。这些不同的文化保护与发展观念在生态博物馆实践中不断得到运用,产生了不同的实践效果,特别是引发出了一些制约文化保护与发展的的问题。笔者认为,对于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应该采取创新思维和模式,按照文化的不同性质进行分类保护与发展。对于那些日益消逝的物质文化,可以采取数据中心的方式,把它们收集起来集中保护,也可以采取给予村民资金和技术等方式,让他们就地化保护;对无形的精神文化的保护与发展,则应该采用唤起民族主体文化自觉的方式开展。只有文化主体意识到自身文化的珍贵,才能进一步唤起他们文化自尊、自爱、自强的自觉意识。属于村民日常生活的行为文化,比如节日、饮食、服装等,则应该尊重他们的本意,让他们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属于遗留至今的制度文化,则应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把它们更好地融进社会主义法制和道德建设中。总之,在生态博物馆建设中,我们应该清楚哪些文化应该采取传统方式进行保护,哪些文化应该顺其自然地随它消失,哪些文化应该在创新中发展保护,建立和实施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理念和策略。

最后,处理好文化保护与发展的当前实践与

长远目标的关系,这是生态博物馆建设的战略基础。基于文化本身的坚韧性、深刻性、传承性和内敛性等特点,文化保护与发展工作必将是一项持久而艰巨的系统工程。生态博物馆建设的终极目标是保存文化多样性、留住人类历史和记忆、促进人的和谐发展。而要实现这个发展战略,则需要我们制定一个结合近期和长期发展需要的方针,抓住当前文化保护与发展的着力点和关键点,探寻一条独特的建设路径。具体来说,当前建设的重点应该加强对博物馆社区文化的挖掘、整理和实时保存;加强对现有珍贵文化遗产的静态保护与活态传承;在解决社区村民的基本生存需要下,通过外在刺激和内在自觉的方式唤起村民的文化自觉。除此之外,要对当前实践及其结果做理性的宣传、认识和研究,对其发展功能和效果不做过大或过小的传播等。只有走整体性、内在性、规律性、反思性基础上的理性建设之路,才会使生态博物馆建设得到可持续发展、社区文化得到有效保护。

三、生态博物馆建设中经济与人文的关系

“生态博物馆于20世纪60年代最早产生于法国,生态博物馆法语为*ecomusée*,英语将其译作*ecomuseum*。生态博物馆是生态(*ecology*)和博物馆(*museum*)的合成语。*eco*作为*ecology*(生态)和*ecionomy*(经济)的语源,出自希腊语*oikos*,即‘家’的意思。”^[26]可见,经济与人文因素始终贯穿于生态博物馆建设中。特别是在第23届国际博物馆协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 ICOM)巴西大会上,新博物馆学运动委员会的主题之一是“生态博物馆与旅游”,这就使得国际生态博物馆的功能和使命发生了变化,即从文化保护转到文化保护、旅游经济与社区发展上。如今,旅游与博物馆成为中产阶级认同的诉求,而中产阶级的本质是以现代性为特征的,因而,博物馆和旅游则迎合了这种现代性^[27]。不可否认,当前中国社会正在快速迈向中产阶级化,走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博物馆旅游正呈现蒸蒸日上的发展态势。当前中国生态博物馆旅游呈现了表层化理念、碎片化形式、感性化群聚及规约性后果等感性化趋势,这一方面让多元主体、时间弥合、空间跨越、去魅化等旅游特征很好地符合和迎合了当代人的文化和心理需要,但另一方面博物馆文化本身独具的人文精神和生活意义则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遮蔽。这就是说,在生态博物馆功能和使命发生变化的过程中,生态博物馆建设中的经济与人文

文矛盾也随之产生:一面想通过旅游去获取经济收益、进而使社区和民众从传统迈向现代,一面又尽力想保留传统、再造传统去满足游客的怀旧需求;一面想通过建设去促进社区和谐,一面却是社区内不同利益者利益纠葛丛生;一面强调建设的可持续发展,一面则是建设资金时常短缺;一面想促进社区主体的文化自觉,一面却在警惕社区民众过于功利化和世俗化。

针对当前生态博物馆旅游中出现的问题,笔者认为在加强旅游规范性的同时,应该努力去寻找生态博物馆生态保护和旅游发展间的平衡点,以便更好地促进生态博物馆社区和旅游的发展。博物馆一定要充分认识到自身的旅游特质,加强与旅游业的合作。用克服行业隔阂、建立协调机制以及合理分配旅游收益等途径去实现博物馆和旅游业相互促进、优势互补^[28]。但在经济与人文的关系中,人文对于生态博物馆建设来说显得更为重要。有经济不一定能塑造人文,有人文就一定会带来经济。“生态博物馆的独特性就在于其所展现出的与时代潮流同步的能力——挑战现况、反省博物馆形象并且赋予其新人文主义思维。”^[29]美国博物馆学者也指出,新博物馆学的观念重心应该从传统博物馆奉为准则的收藏、保管、陈列等功能转向去关注社群和社区的需求^[30]。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社区民众的终身教育等人文精神在新博物馆学中得到广泛倡导。在生态博物馆建设中,应该如何展现这种精神?首先,要尊重文化。在现有条件下,要让社区民众感受到自身文化的重要性,进而对其文化进行有效保护,这有一定困难。这就需要文化学者和地方精英们通过各种方式对社区文化进行挖掘、整理、宣传,在村民外围形成一股对其文化独特性和价值性的认同和赞赏,以此去引导社区民众对自身文化的重视和珍视,避免对社区文化认识产生外热内冷的尴尬局面。其次,要尊重主体。尊重主体主要体现在肯定文化主体的首创地位、现实选择和生活样态。对于文化主体的首创地位的彰显,则集中体现为尊重其在建设中的主人翁地位,发挥其在生态博物馆建设中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而对于社区村民选择外出打工、旅游开发、民俗汉化等一系列行为,我们应该以宽容、平和、理解的态度去看待,因为这恰恰是他们顺势而来的生活样态。最后,要尊重自然与人的和谐。独特文化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自然和人文有机联系在一起的产物。生态博物馆建设要充分考虑社区地理特征,真正做到尊重自然、敬畏自

然、感恩自然,切实维护好生态博物馆建设生境。同时,要客观而又科学地认识社区中变迁着的人,尊重和理解他们当前的实践。只有自然和人实现动态平衡,社区才会是活态而又灵动的,社区才能达到和谐统一。

总之,生态博物馆建设要充分考虑经济因素,但更应该重视人文价值。经济和人文不是“斯密难题”,而是相互促进因素。在建设中,我们应该摒弃过于功利的唯经济建设论,即认为在经济没有得到很好发展、大量资金没有投入的社区,建设生态博物馆是不可行的错误思想和观念;也要摒弃悬空的唯文化建设论,即错误地夸大文化建设的独特性、独立性、主观性的唯心主义想法。只有辩证地去看待建设中的经济与人文因素,在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结合下去建设生态博物馆,才能彰显生态博物馆巨大的经济价值和人文意蕴。

四、结语

在当前中国生态博物馆建设中,主体和客体、建设与文化保护、经济与人文的矛盾还在继续,但在这些矛盾关系中,我们逐渐认识到产生这些矛盾的缘由。即生态博物馆是一种理念和过程,而不是一种模式和结果,它本身需要在冲突实践中发展;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了矛盾的产生及解决的长期性;中国生态博物馆大都建立在少数民族地区,且多有靠个人因素及偶然性去运作的可能,这预示着解决矛盾的复杂性和艰巨性。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和源泉。这些矛盾一方面成为我们建设生态博物馆的桎梏,一方面又是我们不断发展生态博物馆的前进动力。在对生态博物馆是“数据银行、观测台、工作坊、展览柜”内涵和建设生态博物馆的国内国际意蕴的宏观把握基础上,笔者认为应该从如下几个微观层面去协调这些矛盾:政府应该加强宏观规划,切实为生态博物馆建设提供资金、制度、人才和政策保障;学者应该加强建设理念探索、传播和指导,让生态性、开放性、整体性、主体性、活态性、和谐性等原则贯穿于生态博物馆建设始终;社区民众要强化自我教育,达到对自身传统的文化自觉。当前,相对于政府和学者层面来说,社区民众的文化自觉显得尤为重要。只有这样,“政府主导、学者指导、民众主体”的中国生态博物馆建设多维体系才能得以真正建构。马克·摩尔(Marc Maure)说:“对社区来说,生态博物馆是一种增强自我意识的工具。”

可使得居民增加对自己文化学问的感情,懂得自己文化学问所表现的价值。”^[31]我们坚信,今天的中国生态博物馆建设定能在唤起社区民众乃至当代中国人的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和文化自觉上作出巨大的贡献。

- [1]张睿腾:《生态博物馆——一个文化运动的兴起》,五观艺术管理有限公司2004年,第212页。
-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7页。
- [3][15][26]尹绍亭、乌尼尔:《生态博物馆与民族文化生态村》,《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 [4]张庆宁、尤小菊:《试论生态博物馆本土化及其实践困境》,《理论月刊》2009年第5期。
- [5][法]乔治·亨利·里维埃著、孟庆龙译:《生态博物馆——一个进化的定义》,《中国博物馆》1986年第4期。
- [6][法]雨果·戴瓦兰著、张晋平译:《生态博物馆和可持续发展》,《中国博物馆》2005年第3期。
- [7]转引自苏东海:《博物馆的沉思:苏东海论文选(卷二)》,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489页。
- [8]“六枝原则”是2000年由挪威专家和贵州省四个生态博物馆的村民代表、地方政府管理机构等,在贵州省六枝特区举办研习班时讨论提出框架后逐步完善的产物。“六枝原则”具体内容包括九个方面:基本精神是文化是人的文化,其价值必须与人联系起来;村民才是其文化的真正拥有者;生态博物馆的核心是公众参与,民主管理;旅游和文化结合,但以文化为先;建设中对于文化的长远和历史性规划永远是最重要的;对文化实行整体性保护;观众有义务遵守一定行为规则;生态博物馆没有固定模式,因文化及社会的不同条件而千差万别;促进社区经济发展,改善居民生活。
- [9]胡朝相:《贵州生态博物馆的实践与探索》,《中国博物馆》2005年第3期。
- [10][19]龚世扬:《探索与实践:对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1+10工程”的回顾、评价和思考》,《广西民族研究》2016年第1期。
- [11]潘守永:《“第三代”生态博物馆与安吉生态博物馆群建设的理论思考》,《东南文化》2013年第6期。
- [12]尹绍亭:《全社会行动,共同建设民族文化生态村》,《中国民族报》2009年3月20日第5版。
- [13]潘年英:《矛盾的“文本”——梭戛生态博物馆田野考察实录》,《文艺研究》2002年第1期。
- [14]方李莉:《警惕潜在的文化殖民趋势——生态博物馆理念所面临的挑战》,《民族艺术》2005年第3期。
- [16]王京传、康红光:《贵州生态博物馆建设》,中国民族博物馆《论民族博物馆建设》,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360

- 页。
- [17]胡朝相:《论生态博物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国博物馆通讯》2002年第10期。
- [18]张涛:《生态博物馆、旅游与地方发展》,《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10期。
- [20]胡朝相:《贵州生态博物馆的实践与探索——为贵州生态博物馆创建十周年而作》,《中国博物馆》2005年第2期。
- [21]黄春雨:《贵州生态博物馆发展思考》,《中国博物馆》2001年第1期。
- [22][23]于富业:《关于中国生态博物馆的初步研究》,南京艺术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
- [24]苏东海:《博物馆的沉思——苏东海论文选》,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39页。
- [25]这是人们对于文化保护与发展关系的不同认识:“要保护,就不要发展”是指对现存文化进行静态保护,不允许文化和社会发展有机结合起来而不断得以发展革新;“要发展,就不要保护”是指要看到现存文化与现代社会之间的互动,从动态视角去认识和理解文化,对文化单纯地静态保护是不合时宜的;“保护就是发展,发展就是保护”是对文化保护与发展矛盾关系的辩证法认识,这种观点看到了文化的多层次特征,把对文化的静态保护和动态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充分体现了文化的本质属性。
- [27][美]纳尔逊·格雷本著、赵红梅等译:《人类学与旅游时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04—305页。
- [28]苏东海:《文博与旅游关系的演进及发展对策》,《中国博物馆》2000年第4期。
- [29]P. Davis. *Ecomuseum: A Sense of Place*. Leicester: University of Leicester, 1999: 189.
- [30]J. D. Harrison. *Ideas of Museums in the 1990s. Museum Management and Curatorship*, 1993, 13(2): 166-176.
- [31][挪威]马克·摩尔著、张晋平译:《生态博物馆:是镜子、窗户还是展柜》,《中国博物馆》2005年第3期。

The Three Relationships in Ecomuseums Development

LI Yin-bing LI Dan

(School of Marxism,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550001)

Abstract: The ecomuseum is a concept and process, rather than a model and result, to be developed in practice. That the role of the people in the community as the main body for ecomuseum building is yet to be established, that the function of the ecomuseum to preserve local culture is yet to be realized, and that the concerns of economic regeneration and cultural rescue is yet to be balanced are three main challenges facing ecomuseum development in China. To better develop ecomuseums in China, the most important is to arouse the cultural awareness and confidence of the people in the community so as to strengthen their role as the main body for ecomuseum construction, to further investigate, study and preserve community culture an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static preservation and dynamic inheritance of existing cultural heritage properties, and to uphold the humanistic value of the museum when developing tourism in ecomuseum communities.

Key words: ecomuseums; multiple relationships; community construction; humanistic value

(责任编辑:黄洋;校对:张蕾)